

论汉肖形印中的斗虎图像

张 今

内容提要：在汉代肖形印中，斗虎图像是较为常见的一种，但一直以来学者对于其表现内容、图像来源却研究不够。本文试对肖形印中的斗虎图像进行全面考察，力图说明斗虎图像的使用是汉人尚勇风气的表现，也是人们趋吉避凶心理的产物。它和青铜器、画像石的制作一样，可能存在某一“粉本”，而这种图像是深深印刻在汉代匠人图像思维中的，并不需要亲眼见到斗虎行为。

关键词：肖形印 斗虎图像 斗虎行为 粉本

今天所见到的肖形印始于商周，《双剑謠古器物图录》著录的“商𤔁玺”（图1）、“商奇文玺”（图2）即具有明显的图像性。^①早期肖形印与铜器制作关系密切，前人多有述及，王伯敏先生（为行文方便，下文谈及研究者时省略敬称）认为其形成即来源于“鼎彝单个花纹的模子”，考察年代早于战国的几枚肖形印，其说可信。^②至于两汉，肖形印大盛，印面图像种类多样，同时期画像砖、青铜器、玉石器等器物的装饰纹样几乎都可以在两汉肖形印上觅得，且囿于印面尺寸，肖形印所选取的往往是大幅画面中的一个片段，而这恰好增加了印面的张力，留给观者许多想象空间。

在两汉肖形印众多的印面图像中，人、兽共存的画面出现较多。这些场景是现实还是神话？这一图像和同时期其他器物上的图像是怎样相互渗透的？它们与中亚、西亚文明中盛行的人兽装饰题材又是否关联？长久以来，肖形印的文化内涵被研究者所忽视，上述问题都没能得到较好的解答。笔者试以人兽题材中最典型的斗虎图像为个案，探讨这类肖形印图像的形成、表现与含义。



图1 商𤔁玺



图2 商奇文玺



① 于省吾：《双剑謠古器物图录》，中华书局2009年版，第129—132页。

② 王伯敏：《古肖形印臆释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03页。

一、汉肖形印中的斗虎

自潍坊陈簠斋辑《十钟山房印举》着意搜罗肖形印开始，近百多年来公、私出版的印谱、图录著录了许多印面为斗虎图像的肖形印，但限于本文篇幅和笔者识见，无法一一列举。仅将《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》（以下简称《故宫》）中的相关印蜕和封泥图片列在下文，另有近年出版的《盛世玺印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盛世》）和《古代肖形印专题展》（以下简称《专题》）两本图录印刷精美且附有高清印面照片，故与《故宫》著录一并作为本文展开讨论的实物资料。^①其他印谱大多仅著录印蜕，难以表现肖形印“泥随款入，曲折毕现”的特点，且就笔者所见并无影响本文立论的印例，故在此省去。

在这些斗虎图像中，还可依据人与虎的姿势分为两类：一为人、虎站立，一为人踞坐或骑于虎背上。《故宫》在解说中将前者称为“斗虎”，后者称为“戏虎”，笔者认为所谓“斗虎”与“戏虎”在表达意象上具有紧密关联，故一并讨论。

1. 斗虎纹印（图3）。穿带印，印面长1.15厘米、宽1.15厘米。印面阴铸一人一虎，左人右虎，皆站立状，人手似持一物。另一面阴刻“文锋”。

2. 斗虎纹印（图4）。穿带印，印面长1.1厘米、宽1.1厘米。印面阴铸一人一虎，右人左虎，皆站立状，人手似持一物。另一面阴刻“文锋”。

3. 斗虎纹印（图5）。穿带印，印面长1.2厘米、宽1.2厘米。印面阴铸一人一虎，左人右虎，皆站立状。另一面阴刻文字不详。

4. 斗虎纹印（图6）。穿带印，印面长1.1厘米、宽1.1厘米。印面阴铸一人一虎，右人左虎，



图3 斗虎纹印（印蜕、封泥），《故宫》62



图4 斗虎纹印（印蜕、封泥），《故宫》63



图5 斗虎纹印（印蜕、封泥），《故宫》64



图6 斗虎纹印（印蜕、封泥），《故宫》65

^① 叶其峰主编《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》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；吴砚君编《盛世玺印录》，艺文书院2013年版；石峰编《古代肖形印专题展》，西泠印社美术馆2015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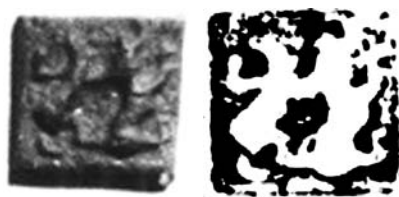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7 斗虎纹印（印蜕、封泥），《故宫》66



图8 斗虎纹印（印蜕、封泥），《故宫》67



图9 斗虎纹印（印蜕、封泥），《故宫》68



图10 斗虎纹印（印蜕、封泥），《故宫》6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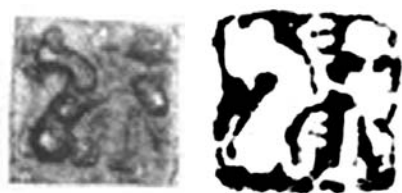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1 斗虎纹印（印蜕、封泥），《故宫》7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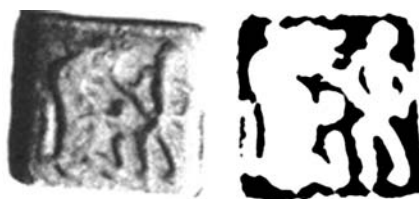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2 斗虎纹印（印蜕、封泥），《故宫》71



图13 斗虎纹印（印蜕、封泥），《故宫》72



图14 斗虎纹印（印蜕、封泥），《故宫》73



图15 斗虎纹印（封泥、印面），《专题》011



图16 斗虎纹印（封泥、印面），《专题》023

皆站立状，人手似持一物。另一面阴刻“长利”。

5. 斗虎纹印（图7）。鼻钮，印面长1.2厘米、宽1.2厘米，通高0.8厘米。印面阴铸一人一虎，右人左虎，皆站立状。

6. 斗虎纹印（图8）。穿带印，印面长1.15厘米、宽1.15厘米。印面阴铸一人一虎，右人左虎，皆站立状，人手似持一物。另一面阴刻菱形纹饰，内刻“日光”，印面四角饰乳钉纹。

7. 斗虎纹印（图9）。穿带印，印面长1.15厘米、宽1.2厘米。印面阴铸一人一虎，右人左虎，皆站立状，人手似持一物。

8. 斗虎纹印（图10）。象钮，印面圆形，直径1.45厘米，通高1厘米。印面阴铸一人一虎，左人右虎。

9. 斗虎纹印（图11）。鼻钮，印面长1.2厘米、宽1.2厘米，通高0.7厘米。印面阴铸一人一虎，左人右虎，皆站立状。

10. 斗虎纹印（图12）。瓦钮，印面长1.4厘米、宽1.4厘米，通高1.2厘米。印面阴铸一人一虎，左人右虎，皆站立状，人手似持一物。

11. 斗虎纹印（图13）。鼻钮，印面长2.1厘米、宽2.1厘米，通高1.3厘米。印面阴铸一人一虎，左人右虎，皆站立状，人手持一物做刺击状。

12. 斗虎纹印（图14）。鼻钮，印面长1.8厘米、宽1.5厘米，通高0.9厘米。印面阴铸一人一虎，左人右虎，皆站立状，人手持一物做刺击状。下部有一蟾蜍纹、一鸟纹。^①

13. 斗虎纹印（图15）。鼻钮，印面长1.1厘米、宽1.1厘米，通高0.8厘米。印面阴铸一人一虎，右人左虎，皆站立状。

14. 斗虎纹印（图16）。龟钮，印面长1.1厘米、宽1.1厘米，通高0.8厘米。印面阴铸一人一虎，左人右虎，皆站立状。

15. 戏虎纹印（图17）。龟钮，印面长1.6厘米、宽1.5厘米，通高1.2厘米。印面阴铸一人一虎，人跽坐于虎背上，双手似持物。

16. 戏虎纹印（图18）。龟钮，印面长1.08厘米、宽1.08厘米，通高1.15厘米。印面阴铸一人一虎，人跽坐于虎背上，双手持物。

17. 戏虎纹印（图19）。龟钮，印面长1.0厘米、宽1.0厘米，通高0.9厘米。印面阴铸一人一虎，人骑于虎背上，一手持物。

18. 戏虎纹印（图20）。龟钮，印面长1.0厘米、宽1.0厘米，通高0.9厘米。印面阴铸一人一虎，人骑坐于虎背上，一手持物。

19. 戏虎纹印（图21）。瓦钮，印面长1.3厘米、宽1.3厘米，通高1.0厘米。印面阴铸一人一虎，人骑于虎背上，一手持物。

以上19枚肖形印中有6枚穿带，5枚龟钮，5枚鼻钮，2枚瓦钮，1枚象钮，钮制与常见私印大致相同，并无特殊。制作以范铸为主，有粗细之分，但大多精细，有几枚印虎身纹饰刻画十分精美。

^① 《故宫》原注“下部有两鸟纹”，第73页。



图17 戏虎纹印（印蜕、封泥），《故宫》74 图18 戏虎纹印（印蜕、封泥、印面），《盛世》411



图19 戏虎纹印（封泥、印面），《专题》020

图20 戏虎纹印（封泥、印面），《专题》022



图21 戏虎纹印（封泥、印面），《专题》024

笔者认为汉代肖形印的功能是多样的，而制作的精细程度不同也恰好印证了这一点。^①

观察上述19枚印的印面图案，构图较为简单，大多为一人一虎平分印面，人或持物，或徒手。但人、虎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？是否如前人注解中所说的“斗虎”或“戏虎”？下文先要对汉代的斗虎行为做一番讨论。

① 关于肖形印的功能，长久以来不乏研究者讨论，大致有图腾说、封泥说、表明职业身份说、趋吉避凶说等几种观点。早年，对于肖形印是实用封检还是供人把玩，王伯敏与何广键两位先生发文各抒己见，此后长期没有定论。近年来冯瑾、董良敏发文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探讨，认为肖形印的功能是多样的，前人诸说都是肖形印功能的一种可能性。笔者赞同此说，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和实物遗存，肖形印的封泥数量远远小于姓名印，可见其征信的功能可能存在，但并不普遍。因为同一题材的图像大量使用让肖形印本身的辨识度降低，所以不能很好地达到取信的目的，本文所论斗虎图像即是一例。至于董良敏认为趋吉避凶是主要功能，虽然比较笼统，但便与讨论。又如本文所列6、8号印形制为穿带，文字内容分别为“长利”、“日光”，是典型的吉语印，可以作为一证。王伯敏：《略谈肖形印》，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8年第1期；何广键：《〈略谈肖形印〉读后》，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8年第12期；冯瑾：《中国古代图形印研究》，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；董良敏：《论古肖形印的文化内涵》，《艺术·生活》2011年第1期；董良敏：《古代肖形印的“趋吉避凶”功能论》，《艺术生活（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学报）》2013年第1期。

二、汉代的斗虎行为

《三辅黄图》卷六有“圈”条目，记载有秦兽圈和汉兽圈，据陈直和何清谷的校点，汉兽圈有九处。^①其中虎圈在建章宫西^②，《三辅黄图》目录中有“虎圈”而文中未见，根据“汉兽圈”下所载“文帝问上林苑”及“冯媛当熊”二事皆发生在登虎圈时推断，正文可能脱漏“虎圈”二字。兽圈的作用相当于今天的动物园和马戏团，在这里可以举行斗兽活动。从文献中看，这是流行于上层社会的活动，皇帝也会参加和观看。如《汉书·外戚传》载：“建昭中，上（元帝）幸虎圈斗兽，后宫皆坐。”^③武家璧曾将汉代的斗兽者分为三类，一类是被迫斗兽；一类是职业斗兽；一类是帝王将相有勇力者。^④可见斗兽行为在汉代并不鲜见，以至于在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《长杨赋》等汉赋中都可见到此类描述。《孔丛子》卷七《连丛子》还收录了西汉孔臧撰《谏格虎赋》一篇，以

设问的口吻阐述了沉迷于“格虎”娱乐的危害：“驱民入山林，格虎于其廷。……以此为至乐，所未闻也。”^⑤斗兽作为一种上层社会的娱乐活动，由此可知虎在所斗之兽中所占比例最大。

参加斗虎的人群在前述武家璧的文章中已经说到，斗虎的方式则以持械为主。《汉书·李广传》载李广孙李禹事：“后愬之上，上召禹，使刺虎，县下圈中，未至地，有诏引出之。禹从落中以剑斫绝累，欲刺虎。上壮之，遂救止焉。”^⑥李禹砍断吊绳，迎虎而刺，是带着剑的，而这似乎很正常。持剑或其他兵器与否并不影响斗虎者的勇猛，只是一种惯例，就像现代的西班牙斗牛士一样，整场角斗下来，斗牛士用到的兵器可谓种类繁多，功能齐全，倒远不如汉代斗虎来得直接。又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记载，儒生辕固生因蔑视老子而触怒爱好黄老的窦太后，被罚入兽圈刺豕，“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，乃假固利兵，下圈刺豕，正中其心，一刺，豕应手而倒。太后默然，无以复罪，罢之。”^⑦此事可证辕固生初入兽圈没有持械是因为被太后惩罚，事发突然，而景帝借兵器帮助他完成刺豕，只是符合斗兽的惯例而已，所以太后只能默然。当然，也有勇猛之士可以徒手斗兽，比如汉武帝子广陵王刘胥、曹操



图22 安阳西高穴大墓出土
“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”
刻铭石牌（M2：139）

① 何清谷：《三辅黄图校释》，中华书局2005年版，第350—353页。

② （汉）班固：《汉书》卷二十五《郊祀志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1245页。

③ （汉）班固：《汉书》卷九十七《外戚传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4005页。

④ 武家璧：《曹操墓出土“格虎”兵器牌考》，《殷都学刊》2011年第3期，第49—53页。

⑤ 傅亚庶：《孔丛子校释》，中华书局2011年版，第448—449页。尽管《孔丛子》一书的真伪和成书年代素有争论，但大致可判断其成书不晚于东晋，其文献价值近年来也愈发受到研究者的认可，所以此处收录的《谏格虎赋》是能够反映西汉或稍晚时期社会情况的。

⑥ （汉）班固：《汉书》卷五十四《李广传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2450页。

⑦ （汉）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一百二十一《儒林列传》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3768页。



图23 满城汉墓M2出土博山炉（M2：3004）及炉盖斗虎图像局部线图



图24 山东肥城东汉墓发现的画像石（局部）

子曹彰等，但这不是常态。2009年安阳西高穴大墓曾出土刻有“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”（图22）、“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”铭文的石碑，其中“格”字虽从手，但“格虎”却不是徒手，而是持械之意，可作辅证。^①由这番论述反观第一节所列的斗虎纹印，笔者已在描述里指出，有若干枚印图像中的人物是明确持物的，以13、14、20、21号印最明显，而其他印由于尺寸太小、制作不精无法辨清，现在来看恐怕大多数都是手中持物，而且所持者应该就是斗虎的兵器。

上文主要是从文献考察汉代的斗虎，那么，肖形印上的斗虎图像和同时期其他器物上的图像有没有照应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1968年在满城汉墓M2的发掘中，出土了一件博山炉。该炉整体雕镂精细，由炉身、炉盖和底座三部分组成，其中炉盖又分上下两层，上层铸出山峦、流云，在云山之间有人物和动物出没，斗虎图像在这出现了（图23）。在这一局部中，人、虎皆站立，相持不让，势均力敌，人物右手似持一物。^②

1956年在山东肥城县发现了一座东汉墓，在前室藻井的东边盖顶上发现画像，上有“建初八年”刻铭，画像自上而下分三层，在中层左侧出现了斗虎图像（图24）。图中一人持戟正在斗虎，虎呈站立状，身姿威猛，两者正在相持，这与肖形印中的斗虎图像几乎完全相同。人、虎之外有一阙，阙上有鸟，阙中坐有一人。^③笔者认为，这座阙应该就是观看斗虎的场所，即《关中记》所记载的“虎圈观”^④。

通过以上不多的图像案例可以发现，斗虎图像在两汉十分流行，出现在各种场合。这种现象一来说明了斗虎行为的存在和流行；二来反映了汉人尚勇的精神，以及希望借助这种图像趋吉避凶的心理。那么，斗虎图像作为现实生活的产物，它与神话类图像的制作是否有不同？其来源又是怎样的呢？

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安阳县文化局：《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》，《考古》2010年第8期，第35—45页。

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河北省文物管理处：《满城汉墓发掘报告》，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253—257页。

③ 王思礼：《山东肥城汉画像石墓调查》，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8年第4期，第34—36页。

④ 刘庆柱辑注《关中记辑注》，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67页。

三、斗虎图像来源试探

通常来说,对于非现实的图像,研究者喜欢用“母题”的概念进行讨论。比如流行于欧亚草原的“一人双兽”母题^①、盛行西亚的阿胡拉·马兹达(Ahura Mazda)象征图像^②等,而对于中国上古人、兽图像的研究,从张光直开始就引入“人兽母题”的概念,讨论对象集中于以虎人铜卣为代表的青铜礼器。^③那么,本文所论斗虎图像与上古的“人兽母题”是什么关系呢?笔者认为两者没有直接关系。

母题的概念应当是不同表现手法所表现的同一主题,比如“一人双兽”母题,不论这里的兽是蛇还是狮子,它所体现的都是调和平衡的主题。而出现在中国商周青铜器上的人、兽图像虽然表达意涵尚不能确定,但一定具有神性,是脱离现实的,这与前文所论述的真实存在于汉代社会的斗虎行为不同。因此,斗虎图像并不能统摄在“人兽母题”之下。至于是否与欧亚草原盛行的人兽图像具有关联,笔者认为也不存在直接的因袭关系。

既然母题不适合斗虎形象的讨论,笔者认为“粉本”的概念倒可拿来一用。尽管“粉本”一词出现较晚,但对于早期美术史中一些具备创作程式的材料,其实可以认为它们是拥有粉本的。^④



图25 六朝博物馆藏“虎啸山丘”拼砖

肖形印即是如此,方寸之间想要通过图像达到普遍征信的目的不大可能,而作为趋吉避凶的器物出现,应该存在着批量生产的情况,虽然相关的印模实物难以见到,但大量肖形印图像大同小异便可以印证这一点。在本文第二节中也谈到,斗虎图像不仅出现在肖形印上,同时也出现在铜器和画像石上,工匠们采集生活中的图像进入墓葬、器物的制作中,这其中一定存在着程式化的样本,而两汉时期崇尚勇武的社会风气也促进了这一图像的定型与扩散。其实,为了表现老虎的威猛,匠人习惯于将虎以站立的姿态呈现,六朝博物馆藏“虎啸山丘”砖(图25)上的立虎图像便是汉代的延续,而考虑到“虎啸山丘”这一场景并不容易在现实中见到,站立姿态的选择很可能就是斗虎图像的截取。

① 郭物:《一人双兽母题考》,《欧亚学刊》第四辑,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,第1—33页。

② 孙武军:《阿胡拉·马兹达象征图像源流辨析》,《西域研究》2015年第2期,第92—112页。

③ 相关研究十分热闹,首先是张光直:《濮阳三鬲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》,《文物》1988年第11期,第36—39页。张先生将人、兽看作是巫、鬲关系,人兽图像具有强烈的宗教性。之后徐良高、高西省、张朋川都发表了较为重要的认识,提出了致厄术、彰显军威、虎崇拜等不同观点,讨论方法越发复杂,答案也越发不可确定。徐良高:《商周青铜器“人兽母题”纹饰考释》,《考古》1991年第5期;高西省:《论西周时期人兽母题青铜器》,《中原文物》2002年第1期,第47—55页;张朋川:《虎人铜卣及相关虎人图像解析》,《艺术百家》2010年第3期,第98—110页。

④ 对于汉代艺术中的粉本问题,郑立君曾就画像石的制作有过讨论,并指出帛画、壁画、漆画等与画像石同理。郑立君:《从汉代画像石图像论其“粉本”设计》,《南京艺术学院学报》2008年第4期,第49—53页。



图26 里耶秦简8-777

既然肖形印上的斗虎图像来自于某种程式化的粉本，那么，粉本的来源又是什么？无疑就是亲眼所见的斗虎景象了，这也是此类图像与神话类图像产生的区别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人、虎搏斗的影像资料，其中虎的姿态与汉代并没有什么差别。不过，在实际的制作过程中，刻制印模的工匠并不一定亲眼见过斗虎，也不一定严格按照粉本制作，他们的脑海中一定存在着各种图像，可以信手而就，里耶秦简8-777号牍上的鹭鸟图案便可说明这一点（图26）。作为行政文书，这块木牍的书写者并没有制作器物的“匠心”，而他却可以熟练地画出一只鹭鸟，对比汉印、铜鼓上的鹭鸟图案，两者极其相似，秦、汉时期人们的图像思维由此可以想见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存在那么多程式相同，却罕有完全一样的两枚斗虎图像印了。

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在最后提一下，本文第一节说到的“戏虎纹印”与“斗虎纹印”是不是一回事？笔者认为，人踞坐在虎背上表达了对虎的制约，人的支配程度较斗虎更高，但两种图像都应该是发生在虎圈中，供汉代上层社会娱乐的一种活动，本质上是相近的。日后若有资料可提供新的思考，还将另作文讨论，同时也期待着各位研究者的批评。

（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在读研究生）